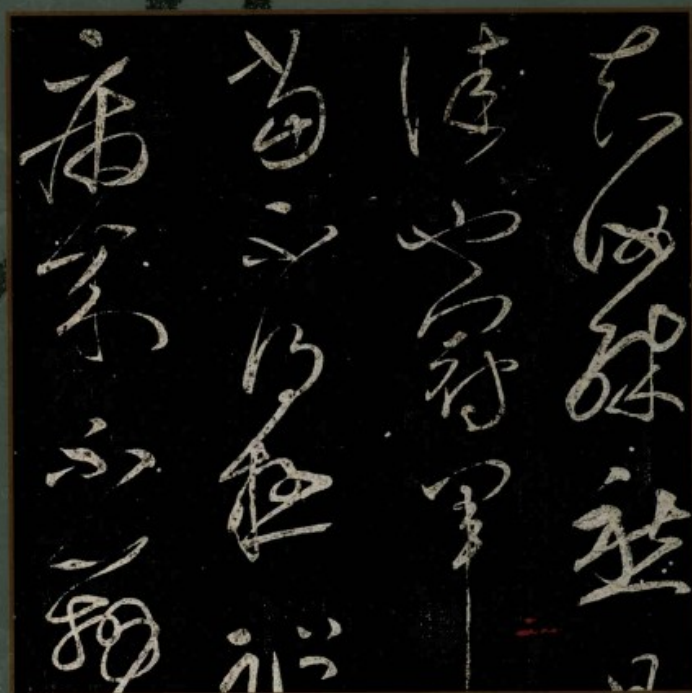


名帖善本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名帖善本



主编：施安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名帖善本

Rare Book of Famous Calligraphic Specimens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编 施安昌

副主编 许国平

编委 尹一梅 王祎

摄影 刘明杰 马晓旋 孙志远

出版人 陈万雄 胡大卫

编辑统筹 张倩仪

编辑顾问 吴空

责任编辑 徐昕宇 周祖贻 王占军

设计 张婉仪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71号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湾耀兴道3号东汇广场8楼

制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08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08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规格

大16开(216 × 286mm) 308面
ISBN 978-7-5323-9700-6/J·95

国际书号

版权所有，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本版图书仅在中國大陸地区发行。

Condition of sale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distributed in Mainland China only.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襄 王 尧 李学勤
张政烺 金维诺 宿 白

总编委主任委员：郑欣淼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杜乃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辉柄
余 辉 张忠培 邵长波 陈丽华
杨 新 杨伯达 单国强 郑珉中
郑欣淼 胡 锤 施安昌 耿宝昌
晋宏逵 徐邦达 徐启宪 聂崇正
萧燕翼

主 编：李文儒 杨 新

编委办公室：

主 任：徐启宪
成 员：杜乃松

李辉柄 余 辉 邵长波
单国强 郑珉中 胡 锤
施安昌 秦凤京 郭福祥 聂崇正

总摄影：胡 锤

总序

杨 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一九二四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一九二五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中间虽屡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乾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溥仪居内廷时，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一九二三年中正殿大火，清宫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二十八册，

计有文物一百一十七万余件(套)。一九四七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从大量的藏品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二千九百七十二箱于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被运往台湾，五〇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二千二百一十一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保管。

五〇至六〇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予「故」字编号，计有七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八件，其中从过去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一千二百余件。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一九四九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凡属新入藏的，均给予「新」字编号，截至一九九四年底，计有二十二万二千九百二十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和近世。历朝历代，均有佳品，从未有间断。其文物品类，一应俱全，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科学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故宫。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宫的藏品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忠诚合作！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们进行这一事业的人们！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于灯下

导言

施安昌

延禧宫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位于东二长街东侧，初名长寿宫，本是内廷所谓「东六宫」之一，明清两朝均为妃嫔之居所。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改称延祺宫，清初，乃改名为延禧宫。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延禧宫遭遇大火，焚毁殆尽，仅余宫门，由此荒废。宣统元年（一九〇九），清廷决议在其原址兴建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水殿。据《清宫词》记载，水殿有着拜占廷式穹顶，以铜作栋，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人在屋内透过玻璃壁窗可以仰望碧天游云，俯瞰鱼翔浅底。隆裕太后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此工程耗资颇多，其时国库空虚，此项修建直至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冬尚未完工，随着清帝逊位，遂被迫停建。



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九三一年，利用延禧宫旧址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的文物库房，北楼三层，东西两楼二层。仍然是红墙黄瓦，与周围一切都很和谐。一九五四年故宫建立文物专库，延禧宫西侧是绘画库，东侧楼上法书库，楼下是碑帖（铭拓）库，北楼则三家共有。自此以后，全部碑帖在此安家达半个世纪，并逐渐扩充到两万五千余件。

二〇〇〇年起，延禧宫的全部文物开始迁出，转入到新建的地下库房，恰逢近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之《名帖善本》卷，选介故宫名帖之余，予所作导言，遂以「延禧宫帖话」名之，以为纪念。

一、刻帖释义

所谓帖，《说文解字》释为「帛书也」。原是指名家写的诗文、信札、帛书等墨迹手书。后来乃有将帖刻于石上或木上，便于学习者传拓，以广流传。这种供习字者作为范本的拓本或拓本之影印本，便统称为帖或字帖。未有刻帖之前，复制流传名家手迹，大致不外临摹、双钩廓填、硬黄纸钩摹、响拓四类。

与碑相比，帖有着很多不同。从外观讲，碑是竖石，帖是横石。帖石一般高尺许，宽二尺五、六寸，也有木版刻帖的。碑建于墓前、路旁或宫庙院内，帖石则置于室内廊下或直接镶在壁上，供人观瞻、传拓。从内容讲，碑一般是记述当代人物与事件，以志纪念。帖则是将古代和前代的名人墨迹（如书札、诗文、文书等等）摹刻上石，拓下来后供临摹书法之用。

帖从编、集体例来看，通常有两类：一是丛帖，即多人书作的汇编或某个人书作的编集；二是单帖，即某人所书一件作品，单独摹刻而流行。

今天已知的丛帖有三百五十余种。较为著名者有宋：《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汝帖》、《群玉堂帖》、《宝晋斋帖》、《凤墅帖》，明：《东书堂帖》、《戏鸿堂帖》、《停云馆帖》、《真赏斋帖》、《快雪堂法书》，清：《三希堂法帖》、《懋勤殿法帖》。集个人书的丛帖有：王羲之《十七帖》，颜真卿《忠义堂帖》，苏东坡《西楼帖》，黄庭坚《黄文节公法书》，米芾《绍兴米帖》、《英光堂帖》，蔡襄《蔡忠襄公法书》，赵孟頫《松雪斋帖》等等。通常讲到的单帖则有：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兰亭序》、《东方朔画赞》、《曹娥碑》、《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唐孙过庭《书谱》，怀素《圣母帖》、《千字文》，钟绍京《灵飞经》，颜真卿《争座位帖》、《祭侄文稿》，元赵孟頫《道德经》等等。

二、刻帖源流

勒石为帖，自唐弘文馆《十七帖》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跋《十七帖》后：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石刻本。今世间有二，其一于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或有以为丛帖（套帖）始于南唐，如所谓《升元帖》，元陶宗仪《辍耕录》说：「江南李后主命徐铉以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但原石原拓早已无存。宋人文献中已无《升元帖》的具体记载。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刻帖，是后世称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

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命王著甄选秘阁所藏历代名人法书，摹刻成一部十卷丛帖，刻于河南开封宋内府，以李廷珪墨拓出，此即著名的《淳化阁帖》。该帖卷一为历代帝王书，卷二、三、四为历代名臣法帖，卷五为诸家古法帖，卷

六、七、八为王羲之书，卷九、十为王献之书。书法作者总计一百零二人，计四百余帖。每卷卷末刻篆书款「淳化三年壬辰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此帖因原拓不多，又因历代名家书迹荟萃一帖之中而深得士子青睐，岁久版毁，公家私家转相传摹，翻刻不绝。如哲宗元祐年间（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年）的二王府帖，高宗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的绍兴国子监刻本，孝宗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的淳熙修内司帖，还有版本甚多的泉州本等等。故宫收藏多种不同版本的阁帖，本书均有著录。其中懋勤殿旧藏之宋拓本，殊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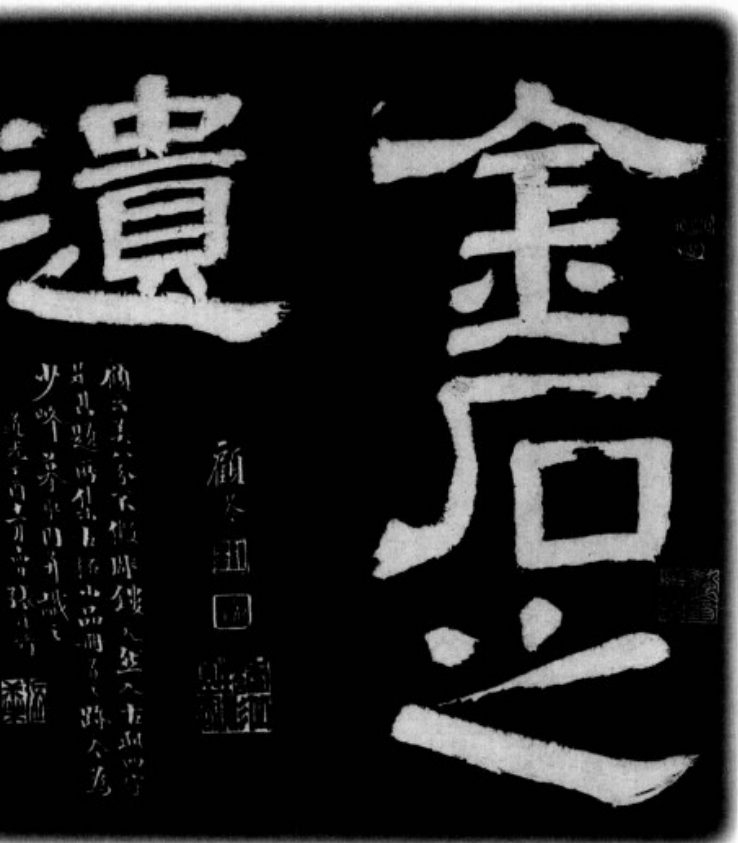
宋代刻帖从初起到兴盛，三百年不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国策崇尚文治，嗜好书画为士林风气，而太宗、徽宗、高宗等本身便是书家，上下相尚，遂习字刻帖蔚为潮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雕版印刷在宋代的发展。有宋一代，雕版印刷技术高度发达。北宋时，中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版高手，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木、枣木，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对文化的重视，加之高超的雕版印刷技术，使宋代的书籍刻印质量之高空前绝后。近代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曾说：「藏书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感，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矣。」刻书与刻帖于技术上差异并不很大。既有文化氛围、上下的推赏，则在雕版印书的同时，从京城到地方的刻帖之风也日益盛行。

宋代丛帖数量庞大，从内容上分有历代综合帖、宋代综合帖和个人专帖之不同。可惜其中多数今已不存，现存可见的丛帖分列如下：

历代综合帖：《淳化阁帖》、《绛帖》、《星凤楼帖》、《大观帖》、《汝帖》、《鼎帖》、《甲秀堂帖》、《群玉堂帖》、《郁孤台法帖》、《宝晋斋法帖》、《澄清堂帖》、《兰亭续帖》。

宋代综合帖：《凤墅帖》、《姑孰帖》。

个人专帖：《东坡苏公帖》（或称《西楼帖》）、《绍兴米帖》、《英光堂帖》、《松桂堂帖》、《忠义堂帖》。



归纳起来，宋代的刻帖有两个特点。其一，刻帖十分普遍，既有官刻又有私刻。官刻指由朝廷和地方各级政府主持的刻帖工作。私刻范围更广，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文人、平民、僧侣，都有热衷者。宋代帝王重书法，喜欢赐字于臣下，大臣为表谢恩便将御书摹刻上石，再馈赠他人。如太宗赵炅淳化二年（九九一）十月，翰林学士苏易简上言：愿以所赐诗刻石。帝为真、行、草三体书各一本，命待诏吴文赏摹勒石以赐。易简仍以百本分赐近臣。（注一）其二，刻帖内容广泛多样，收入名家信札、诗词、文赋、儒道经典之外，题字、题名、题额、前代碑版、古器铭文等等各色俱有。

元代刻帖，世存稀少。逮至明代，刻帖的发展表现在嘉靖以后，特别是江、浙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书画家与藏书家又集中于此，遂成为明代刻帖的中心。明前期刻帖较少，多以宗室刻帖闻名，如周宪王朱有炖于永乐十四年（一四一六）所刻的《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晋庄王之子朱奇源于弘治九年（一四九六）所刻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此二帖皆仿照《淳化阁帖》的体例，集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再添加宋、元人书迹摹刻，影响较大。嘉靖以后私家刻帖逐渐兴起。由于辑刻人都为书法家、收藏家和鉴赏家，故选择慎重，摹勒精善。明季刻帖有案可查者有七十余种。其中上乘之帖有：《真赏斋帖》、《停云馆法帖》、《来禽馆法帖》、《墨池堂选帖》、《郁冈斋墨妙》、《晚香堂苏帖》、《快雪堂法帖》等。

明代后期刻帖精良的另一原因是对摹刻的重视。赵宦光曾言：「名帖易存，名石难得。非出于书家手勒（按：即将书迹勾摹于石），非名帖也；非出于精工手刻，非名石也。余家近藏《停云馆帖》贞珉，乃文待诏为之冰鉴，国博（按：文彭）、和州（按：文嘉）两先生为之手勒，温恕、吴肅、章简甫为之手刻。镂不计工，惟期满志。完不论日，第较精粗。凡此诸公每构真迹古拓，非弥月穷年不轻摹拓。」（注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摹刻精益求精的要求。

及至清代，刻帖之风极为盛行，种类和数量远胜于前代。首先是宫廷刻帖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清朝统治者虽是满族，却倾心汉族文化，历代帝王对于书画都十分喜爱，其中尤以康熙、乾隆二位皇帝为代表。

康熙、乾隆勤于临池之外，还喜好组织刻帖。清代帝王刻帖始于康熙皇帝，他曾敕令摹勒历代名人书迹汇成《懋勤殿法帖》（图59）二十四卷和集皇帝自书的《渊鉴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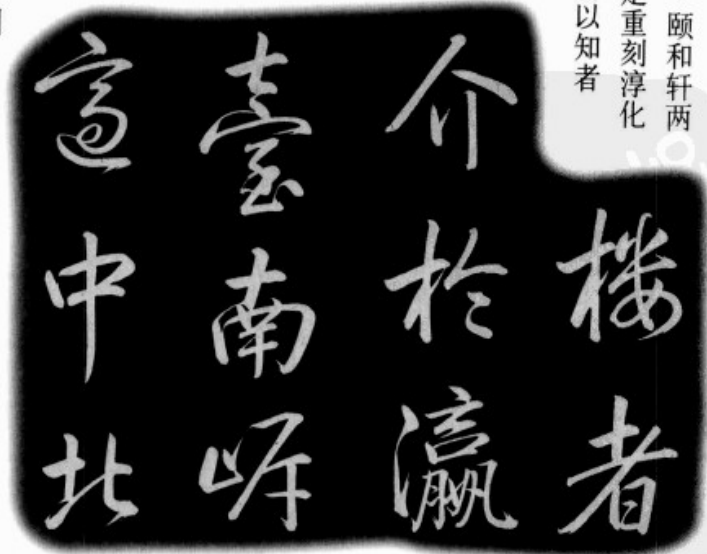
十卷。乾隆皇帝对书画的热爱超过前辈。乾隆元年，皇帝下令摹勒其父雍正皇帝的书作，成《四宜堂法帖》六卷、《朗吟阁法帖》十六卷。此外，他还将在内府皮藏历代法书刻成《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图63）三十二卷，并于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将自己御笔所写的诗、经书以及临

米南宮畫
漢十八侯銘
班固
魏、相國弘榮不造御國
綱維東統樞機文昌四友

摹古代书家名迹摹勒上石，刻成《敬胜斋帖》（图65）四十卷，原石现嵌在故宫乐寿堂、颐和轩两廊。后又集刻自己御题诗《怀旧诗帖》四卷。并为《淳化阁帖》配上释文，刻成《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图1）十卷。这些帖刻成后，大多深藏宫苑，传拓很少，流传在民间更少，所以知者不多。本卷此次出版，将其部分选出，以飨读者。乾隆以后，宫廷刻帖活动逐渐减少。刻帖水平和数量也逐渐下降，难复康、乾之势。

除宫廷刻帖之外，清代民间刻帖也呈现鼎盛局面。清代早期的民间刻帖大都是集历代名人书法的丛帖。如下永誉的《式古堂法帖》虽始于明末，刻成却已到了清代。下永誉为清初著名收藏家，其所刻法帖，鉴别之精细，刻工之优良，于法帖中可谓一流。至于清代初期集刻个人书法的法帖，以集王铎书法的《拟山园帖》（图55）和集傅山书法的《太原段帖》（图58）最为著名。到了清代中后期，刻帖之风更为盛行。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私家刻帖。像曲阜孔继涑刻有《玉虹楼法帖》（图75）、《玉虹鉴真帖》、《玉虹鉴真续帖》、《国朝名人法帖》（图74）等。著名书法家钱泳一生刻帖数十部，其中《经训堂法书》（图78）、《清爱堂帖》、《写经堂帖》、《秦邮帖》（图100）、《吴兴帖》都是刻帖中的精品。清后期，虽然朝政颓坏，国势日微，但检点刻帖，仍不乏精品。道光年间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藏真》（图122）、伍葆恒所刻《南雪斋藏真》（图124），光绪年间陆心源所刻《穰梨馆历代名人法书》、杨守敬所刻《邻苏园法帖》（图131）等，皆可称晚清刻帖之精华。

从刻帖的地域看，康、乾时，江浙两地仍为刻帖的中心。本书著录之清代刻帖多为该地区辑刻，不再赘述。乾隆以后广东刻帖勃然兴起，当地的富商巨贾，纷纷附庸风雅，结交文士，搜求法书，竞相摹传。其中著名者有吴荣光《筠青馆法帖》（图112）六卷、梁九章《寒香馆藏真帖》六卷，廖姓《观海堂苏帖》（图118）一卷、潘仕成《海山仙馆藏真》（图122）十六卷、叶应旸《耕霞溪馆法帖》（图123）四卷、潘正炜《听帆楼法帖》六卷、伍葆恒《澂观阁摹古帖》四卷、《南雪斋藏真》（图124）十二卷、孔广陶《岳雪楼鉴真法帖》（图128）十二卷等。



三、刻帖之编排

经过一千年的发展，刻帖已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系统，帖学也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有着专业的名词和概念，为方便读者鉴赏阅读，特于编撰之际，作简单说明。

(一) 帖名：帖有名，置于开卷之首，多以隶书或篆书写。但宋代刻帖多不标帖名，因时人习称而得名。如淳化帖、大观帖都以刻帖时之年号而得名。如绛帖、汝帖、潭帖则都是以刻帖的地点而得名。此外，以刻帖主人的斋堂号命名者最为普遍，如阅古堂帖（韩侂胄），宝贤堂帖（朱奇源），东书堂帖（朱有炖），戏鸿堂帖（董其昌），停云馆帖（文征明），真赏斋帖（华夏）等等。

(二) 卷次：一般而言，帖分卷次，或上、中、下，或一、二、三、四，或子、丑、寅、卯，多标于帖名之下，也有不标卷数者，较少见。特别要指出的是，一部帖通常会裱为若干册，每册习惯也称为一卷，实际上与刻帖时所分的卷次不同。有刻帖结束若干年后，继续再刻者，称该帖的续刻，三刻。

(三) 标题：帖中标题分两级，卷标题和篇名标题。例如《淳化阁帖》十卷标题如下：历代帝王法帖第一，历代名臣法帖第二，历代名臣法帖第三，历代名臣法帖第四，诸家古法帖第五，法帖第六王羲之书，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法帖第九晋王献之一，法帖第十晋王献之二。这类标题标书家，不标篇名，凡淳化阁系统的帖和在淳化阁基础上增删之帖其标题大体如此。

还有一种标题形式，如《汝帖》十二卷，其标题如下：三代金石文八种汝刻一，秦汉三国刻书十五种汝刻二，晋宋齐梁陈五朝帝王书三十行汝刻三，魏晋九人书四十八行汝刻四，晋度江三家十七帖四十八行汝刻五，二王帖并洛神赋汝刻六，南朝十臣书汝刻七，北朝胡晋十二人书汝刻八，唐三朝帝后书汝刻九，唐欧虞褚薛书汝刻十，唐六臣书汝刻十一，唐讫五代诸国七人书二百六字汝刻十二。这类标题不在卷首而在卷尾。标题内含时代、书人、品类、篇数、行数、字数等成分，情况不一。



刻帖中大部分帖都不标出篇名，只有少数名篇才标名，如「兰亭序」，再如被统称为「晋唐小楷」中的《乐毅论》、《曹娥碑》、《洛神赋十三行》、《东方朔画赞》等等。诗文则要有原题的篇名。刻帖中数量最多的是尺牋，尺牋本无篇名，在帖书中往往取尺牋中最初二字或者文中较重要的两个字定名，如王羲之的《上虞帖》、《王略帖》，虞世南的《左脚帖》、《积时帖》等，皆源于此。

(四) 刻款：《淳化阁帖》各卷卷末有款「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真赏斋》卷末刻：「嘉靖改元春正月既望真赏斋摹勒上石，长州章简甫镌」。此皆刻款，以示刻帖的时间和帖的主人。刻工师姓名一般用小字另行标出。

帖刻多卷，非一两年能竣工。刻款表示的是开始，还是竣工，还是中间某个时刻，并不明确。长州文征明刻《停云馆帖》十二卷，各卷尾年款不同，从嘉靖十六年春正月至三十九年夏四月，历时二十三年。

(五) 刻跋：指交待与刻帖相关情况的跋文。一般而言，帖之刻跋多在全帖末尾，也有在中间某一卷帖尾。署名有主持刻帖者本人，也有别人代言。如宋代王采刻汝帖十二卷，在最后一卷末留下题跋申说刻帖缘由：「采来汝踰年，吏民习其疏拙，不甚谄以事。闭阁萧然，奉亲之外，独念弃日偶得三代而下讫于五季字书百家，冠以仓颉奇古，篆籀隶草真行之法略具，用十二石刻置坐啸堂壁。其论世正名于治乱之际，君子小人之分每致意焉。识者谓之笔史，盖使小学家流因以博古知义，不特区区近笔砚而已。大观三年八月上丁，敷阳王采记。」

四、刻帖之考鉴

法帖的用处主要是临池习书，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处想讨论一个问题：帖的好坏取决于什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巖之秀岳橫基渭
濱涵之靈水吐岫標

(一) 书法之优劣

对于刻帖来说，好的书法最重要，这有赖于三个因素。第一，刻帖时依据的底本是否可靠，书法好不好。几乎流传下来的每种古法帖都有若干本子，或是原迹，或古摹本，或石本。入帖前必须慎重选取好的本子，这是至为要紧的。第二，要有高手摹勒上石方能逼近原貌，毫发无爽。第三，拓工技术要娴熟精良，可以达到钩魂摄魄的境地。三者结合才能使书法精彩动人，缺一不可。

(二) 辨别是原刻还是翻刻或是伪本

此事需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找到可信的原刻本仔细校对，若确定为原刻，还有孰早孰晚的问题。早本完好，晚本则损，泐较多。如果帖的原石仍在，就多了一重可信的证据。第二，查阅有关文献，看情况是否符合前人相关的著录和记载，帖后的题跋也十分重要。翻刻本是依照原帖拓本摹刻出另外一本，名帖往往有翻刻。翻刻精细者近乎原刻本，尚有价值，翻刻粗劣者面目全非。宋帖传本罕见，翻刻佳本仍足珍视。伪刻本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甲帖改头换面作乙帖，如把标题、刻款移花接木充作别帖。另一种是古帖早已失传，帖贾据一些记载杜撰拼凑出另一古帖。但当原帖一旦出现，便被揭穿。

于此特举《松桂堂帖》考辨为例加以说明。一九九五年冬，日本人宇野雪村将碑帖若干遗赠故宫，内有米芾书残帖一册。此册墨纸三十二开，字行很高，前后有附页，刻手精良，纸墨淳雅，经折装，为明前旧物。〔注三〕封面题签「宋拓宝晋斋帖雪村题」。前附页存旧签：「宋米芾帖」，明王铎题。另一：「宋名贤帖」，无款。再有成亲王永理观款一条。后附页存光绪年间翁同龢跋两则。帖内收藏印有：「明蠡台袁伯应家藏图书」、「均斋收藏」、「翁同龢印」等，说明此帖明清时曾被袁枢、翁同龢等收藏。帖的内容顺序如下：

篆书「宝晋天下第一法书」八字；米芾篆书「宝晋斋」三字，米友仁跋；米芾书「海岳」二字，米友仁跋，米巨容跋；谢安书八月五日帖；王羲之书王略帖；王献之书十二月割至帖，米巨容跋；米芾书登山之字，米巨容跋；米芾书蒋延祖夫人钱氏墓志，向子諲跋，米巨容跋；米芾书净名斋记，米友仁题；米芾书七律一首（「山晚烟栖树」）及题记，米友仁跋；

米芾书参赋，米友仁跋，米巨容跋。

前贤为帖起了三个不同的名称，表明帖名难以确定。那么，究竟是什么帖呢？道光、咸丰年间帖学家程文荣（字兰川）的《南村帖考》记载过《松桂堂帖》一事：程得到米芾书残帖二十一页，然无标题。其中「功名」、「董源」、「淮南」三帖后都刻有米芾重孙米巨容跋。此帖字行极高，刻工也好，是明末涿州冯铨旧物，有张照题记。过去程还见过米芾《祷雨灵验诗》，后面巨容跋讲：「岁在戊申，备员庐山仓掾，文简曹公再世孙尊民出示先南宫《祷雨灵验诗》墨迹，百拜敬观，因砦石松桂堂，与好事者共之。」又其跋《墨庄帖》云：「用入宝晋斋以永其传。」据此知皆南宮书迹而刻于庐山之松桂堂也。（注四）由此，程文荣遂称所得二十一页米帖为《松桂堂帖》。

故宫的三十二开残帖后面有翁同龢光绪元年（一八七五）题跋：「是帖不见前人著录，近人程兰川《南村帖考》谓：「藏有二十一页乃涿州冯文安故物，张文敏题记者。」内有《祷雨诗》，巨容跋云：「备员庐山仓掾……因砦石松桂堂，与好事者共之。逐日，为《松桂堂帖》。」又谓：「覃溪先生《复初斋集》所称《英光堂帖》五册中《催租》、《墨庄》二帖无倦翁跋而有巨容跋。及《浯溪铭》、《吕表民帖》有温革跋者必皆巨容同时所刻，后人误装入《英光堂帖》耳。」又硃山蒋氏有《相义录》云云。南村所考如此，然终究不知是帖何名，共若干卷也。光绪九年余浮海北行，候风沪上。书贾凌云阁某姓以是册求售。开卷烂然，定为宋拓。乃割五十金得之沪上。」

可以看出，翁同龢的印象是「开卷烂然，定为宋拓」。因帖后多有巨容跋，于是将它与程氏讲的松桂堂帖联系起来。但此帖内容与程讲的二十一页均不同，故翁氏仍存「终究不知是帖何名，共若干卷」的疑问。

一九九五年此帖归故宫后，启功先生甚看重，借回赏析、推敲。归还之时，于帖后添写了一篇题跋，曰：「此米友仁孙巨容刻其曾祖所宝晋贤法书与夫溪堂手泽一册，即谓《松桂堂帖》者也。《松桂堂帖》之名见于近世程氏《南村帖考》。然



程氏仅著录畸零二十余页，今亦不得而见。此本实其首册。自「宝晋斋」额、「海岳」榜字、谢安及羲、献三帖，巨容跋称摹自石本。以下米老各帖，俱不见他刻，是可宝也！功昔得《淮山杂咏》残碑拓本，书五律数首，与此帖所刻皆在英光集外。又得王虚舟临《相义录》一卷，乃米老起草之文，亦不见集中。帖刻不但米书可喜，其文辞并足辑佚焉。昔年，琉璃厂张彦生曾语功曰：「《松桂堂帖》目录幸已得见。」不知录有副本否也？一九九六年一月廿八日。」

启功先生明确肯定残帖就是《松桂堂帖》，根据《南村帖考》应有如下理由：（一）宋刻米帖。（二）字行极高。（三）帖后有巨容跋。（四）帖首有「宝晋斋」额，「海岳」榜字，谢安及羲、献三帖。巨容跋称摹自石刻。又《南村帖考》载巨容跋《墨庄帖》云：「用入宝晋斋以永其传。」两方面相符合。因此，启功称「此本实其首册」。

于是，这本米帖就被定为《松桂堂帖》，今二十一页本不知在何处，鉴帖不易。至于《松桂堂帖》共有几卷，仍有待以后的发现、考证了。

五、本书编撰体例

前文已概述刻帖释义、源流、编排及考鉴等帖学内容，篇幅所限，不再深入。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本卷编撰体例。

（一）所选皆为具有很高书法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法帖原刻本，已无原刻本存世的宋代刻帖则酌收宋、明翻刻本。

（二）以丛帖为主，兼收少数单帖。由于单帖源流错综复杂，故仅收入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宋拓本。

（三）每种刻帖著录以下各项：帖名，即帖首标题；刻帖年代及拓本年代；主持刻帖者、编辑者、摹勒镌刻者；帖的卷数、册数及故宫存帖情况；装裱形式；题跋、批注；鉴藏印

